

老钱票

伍圓
老钱票

老重庆影像志

曾繁模 李玲◎编著



老重庆影像志 ◎ 十

重庆出版社

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

501980

社

拾 与华盛顿 伦敦 莫斯科 齐名的 老重庆 老山城

《老重庆影像志》



小小钱票，关乎民生国计，锱铢半钱，牵动时代神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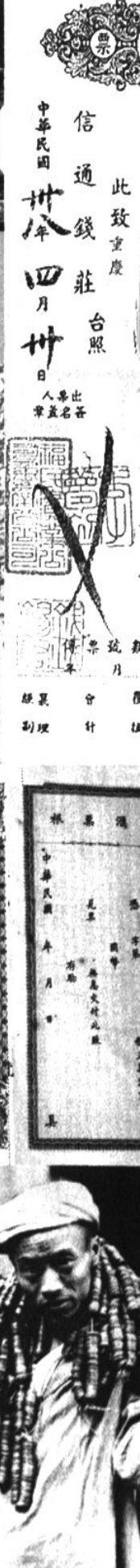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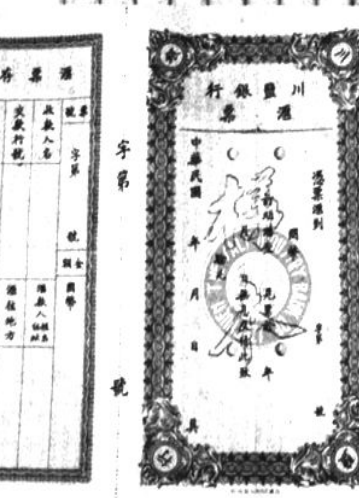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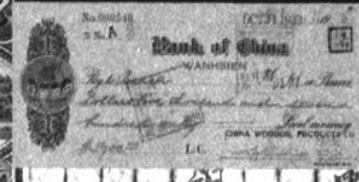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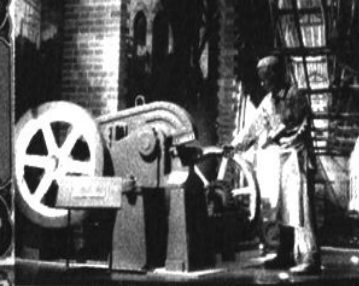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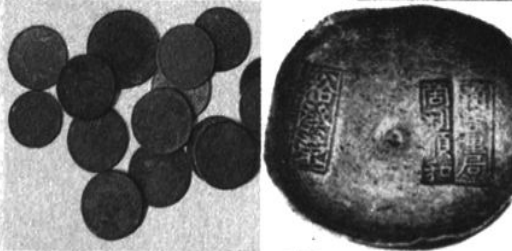
龟、贝、木、石、玉、金、银、铜、铁、纸……流动聚散，悠悠千载。近代以降，重庆曾一度扮演了全国金融中心的角色。老钱币、老票证，在重庆上演幕幕悲喜剧。

看，近代老重庆，几多政治风浪，几多经济狂潮！

看，巴渝老百姓，几多喜怒哀乐，几多荣辱兴衰……

曾繁模 李玲 编著

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





目 录

总 序	1
前 言	4
票号、钱庄	10
票号	10
钱庄	12
晚清金属币	17
银两	17
制钱	20
银圆	22
外国银圆	24
铜圆	25
晚清纸币、股票	28
户部官票、大清宝钞	28
中国通商银行银两票、银圆票	30
大清银行银两券、银圆券	34

川汉铁路股票	37
民国前期的银圆、铜圆	39
汉字银圆	39
袁头大洋	41
云南银圆	43
中山大圆	44
汉字铜圆	46
旗版铜圆	51
川字铜圆	51
马兰钱	53
民国前期的官办银行纸币	55
大汉四川军政府军用银票	55
中国银行兑换券	56
云南中国银行兑换券	61
四川银行兑换券、重庆官银号兑换券	62

中和银行无息存票	68
四川地方银行兑换券	69
重庆商业银行纸币	76
聚兴诚银行汇票	76
四川美丰银行兑换券	78
重庆川盐银行汇票	83
重庆市民银行（重庆银行）兑换券	87
统一货币时期的国家银行纸币	95
法币	95
战时债券、储蓄券与“献金”	107
关金券	112
金圆券	116
银圆券	129
第一套人民币	133

总序

《老重庆影像志》

王川平

方面，尤其是对老重庆的个性与嬗变、老重庆的灵性与魂魄、老重庆的根与源，力图以图文并茂的表述引起读者的注意，与读者作寻根之旅。本丛书的作者与编者，都是从事文物、图书、档案、出版、历史和文化研究等方面工作多年的优秀人选，既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又有专门知识方面的学术积累，并尽可能在文字处理上通俗、生动、准确。丛书使用的两千多张历史照片，许多是第一次公开出版，足见其珍贵和罕见。

重庆是一座具有世界历史与文化价值的城市，对于这一点，笔者在主编该丛书及撰写《老房子》的过程中坚信不移。这不是直辖后的文化自大，而是遵循“实史求是”的原则准确对待重庆历史得出的结论，是依据古为今用的原则建设重庆新文化的需要。可惜的是我们总以为自己的文化家底不够厚，其实是我们现时的努力离目标还有较大的距离。令人高兴的是直辖之初，笔者提出把重庆建设成为与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相适应的文化中心的文化建设远期目标，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市民所接受，正在成为这座城市的规划和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老重庆影像志》丛书的出版，确实是一件可喜可贺可敬之事。

看着这座古老的城市慢慢长大

尽管重庆直辖才十年，但它却很古老，尽管重庆正以惊世的速度在长高、长壮，但它曾经十分古朴而低矮；尽管重庆一天天在变得靓丽，但它灰蒙蒙而沉甸甸的底色仍存留在记忆之中。当楼房的样式和市民的生活越来越趋于类似的时候，这座城市的文化性格与城市品质就变得像空气和水一样重要和宝贵。

历史与现实就是这样复杂，这样磕磕碰碰。重庆的文化人一方面惊讶于这座城市成长的速度，一方面惊讶于在此速度拉动下消逝了的那些值得保留的东西。这种惊讶同样是复杂和美好的，因为他们不因惊讶而停住手脚，停止思考与行动。眼前这套《老重庆影像志》丛书就是他们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老重庆影像志》丛书共十本，分别是《老城门》、《老房子》、《老街巷》、《老码头》、《老地图》、《老广告》、《老档案》、《老行当》、《老风尚》和《老钱票》。它们从不同的视角，管窥这座城市的昨天，内容涉及市政变迁、政治演变、经济发展、市井生活、文脉流转传承等等





纽、转口贸易城市，以及区域性商品集散中心。乾隆《巴县志》描绘：“渝州……三江总汇，水击冲衢，商贾云集，百物萃聚……或运自滇、黔、秦、楚、吴、越、闽、豫、两粤间，水牵运转，万里贸迁。”千百年来，以成都为中心的商贸经济重心开始东移，重庆首度成为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的商贸经济龙头，并开始与国际市场发生经济联系。在开埠前，重庆每年对国内的贸易总额已达2430万海关两，占全川贸易总额近60%的份额。

中国西部市场的迅速发展及诱人的商业前景，重庆，这个让英国人“垂涎已久的口岸”，便成为了英人开放西南战略的首要目标。英国政府迫不及待地采取各种手段向清政府施压，促使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出台，重庆遂成为对外通商口岸。1891年3月，重庆海关成立，标志重庆正式开埠。重庆的近代历史也由此开始。重庆开埠后，商贸水平进一步提升，并刺激商业资本更大规模地集聚，直接为四川金融中心东移重庆创造了条件。随着长江上游商贸中心的形成，直接为商贸服务的旧式金融业，如票号、钱庄和近代意义上的新式银行相继在重庆兴起。

晚清时期的重庆，主要是使用传统的银两和铜钱，尤其是大宗商贸，所需银两的长途运输和保管非常不便且十分危险，一些商号开始经营大额异地汇兑业务，

货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作为一种交换的媒介，它一头连接着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犹如社会经济的中枢神经，一头连着消费，其购买力的潮起潮落，与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及利益休戚相关。同时，它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一枚硬币，一张纸钞，都能折射出时代社会的荣辱兴衰，诉说人间的几多悲欢离合，反映不同时期钱币制造的工艺技术及文化特色。

进入晚清时期，我国的货币呈现出一种新旧交替、中外混杂、官私并存，银、铜、纸并用，货币名目、规格纷繁复杂的局面。中国传统的银两、铜钱、纸币，在近代西方货币文化东渐的影响下，逐步让位于近代银币、铜币、银行纸币。位于长江上游、四川东部的区域性中心城市——重庆，在其社会大背景下的货币近代化历程及其发展中，又显现出自身的诸多地域特色与个性。这些曾承载着不同历史使命的老钱币，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重庆这座古城的一段辉煌与曲折。

清代中期以来，重庆逐步从明代以来的川东军事重镇向商业城市转化，贸易的迅速发展，为重庆的崛起和重庆金融业新格局的形成带来了机遇。长江干流航线，为全国性货运航线，重庆则为长江贸易主航线的西部起点。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内外相连的黄金水运网络，使重庆成为东西部经济物流传递交换的水运枢

通商银行重庆分行。重庆第一家地方官办银行，是1905年开办的浚川源银行，该行隶属于四川藩司，总行设在重庆，并在成都设分行。1909年大清银行（前户部银行）重庆分行开业，并相继在成都、自流井、五通桥设立分支机构。这些银行在重庆的开办，反映了重庆金融业近代化的重要进程，同时，也标志着重庆成为四川金融中心的地位初步确立。

清末，重庆的金融货币正处于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传统的银两、铜钱仍是市场流通的主要货币，同时，我国自铸的新式银圆、外国银圆、机制铜圆、银行纸币也开始进入流通。1896年，四川总督鹿传霖饬令重庆地方政府，从湖北运回一万元银圆于重庆市场试用，次年又赴湖北运回银圆四万元投放重庆市场，重庆成为全川官方明令率先使用新式银圆的地区。此外，各种外国银圆早在明朝晚期已开始流入中国，约在开埠前后，各式铸造精致、印有各种艺术图案的外国银圆渐次流入重庆，西方货币文化对重庆的影响开始显现。

1901年，清政府准许各省开铸铜圆，四川当局先后在成都、重庆各设铜元局一所，重庆铜元局于1905年开始筹建，全套引进英国和德国的先进设备，具备日产铜圆40万枚并兼铸银圆的能力，是重庆第一个铸币机构。在纸币方面，较早的有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但

成为早期的票号。1831年，中国第一家票号，山西平遥人创办的日升昌票号在重庆诞生，其后，山西的平遥、祁县、太谷以及云南、浙江等地兴起一大批票号，并纷纷在重庆开设了分号，由此拉开四川金融中心东移的序幕。钱庄是以经营存贷款业务为主的旧式金融机构，由早期的换钱铺和倾销店发展而来。随着重庆转口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1892年，重庆推出统一标准的新票银在本地市场流通后，商家对资金数量、银两标准和存贷效率等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钱庄业在重庆应运而生。1894年，重庆历史上第一家钱庄——同生福钱庄正式开业。

银行是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鸦片战争以后，外国银行盛行中国，所发纸币畅通无阻并获得高额利润，使中国有识之士认识到自办银行的重要性。如1896年，盛宣怀奏称：西人积聚举国之财，为扶持工商发展之根本，而“综其枢纽，皆在银行。中国亟宜仿办，毋任洋人银行，专我大利”。终于在1897年，经清政府批准，由当时任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盛宣怀创办的，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1904年，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大清户部银行宣告成立。其后，新式银行逐步在国内各地开办。重庆历史上的第一家银行，即是1899年来渝开设的中国

130个，其中重庆或重庆银行的派出机构就占120个。尤其是以聚兴诚为首的川帮五大银行为主体，加上滇黔银行组成的华西集团，与以江浙财阀为主体的华东集团，直鲁地区的华北集团，广帮为主的华南集团，共同构成了覆盖中国东西南北的银行业集团。重庆不仅成为四川的金融中心，其在整个西南地区的金融地位也十分显著。

另一方面，在民国建立的第二年，袁世凯便窃取了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国内政局很快出现分裂，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以孙中山与南方军人组成的与北洋北京政府相对峙的广州政府。四川各派军阀面对南北政府，则根据自身利益，采取见风使舵，左右逢源的态度，时而靠南时而投北。1915年，滇黔护国军人川讨袁，各军阀派系之间的矛盾更趋复杂，冲突更为激烈，川军与滇黔及北洋系军阀间战争不断。四川防区制建立后，各大小军阀划地为营各自为政，为争夺地盘及利益，20余年间，全川共发生大小战争达400多次。而重庆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川内经济、金融中心，便成为川、滇、黔各路军阀垂涎三尺，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在这种背景下，重庆的银钱业在发展中曾遭受多次打击和破坏，或因屡受挫折而歇业。凡进入重庆的军阀，还以金融货币为工具搜刮

此纸币在四川、重庆流通并不普遍，稍后，有中国通商银行发行的银两票和银圆票，大清银行发行的银两券和银圆券等。

1911年至1935年前的民国时期，重庆的金融货币，承接并完成晚清以来的货币近代化历程，并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变的局面。一方面，到30年代中期，重庆的商贸业获得长足发展，无论在商品结构或是流通渠道以及商业组织形式、管理体制方面都有了较大变化和新的发展，商品交易量比19世纪末有了数倍的增长。一个以重庆为中心，连接我国中西部地区，辐射吸引四川和西南地区的市场体系已经形成。由此，与之服务相配套的金融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国家、地方、商业、外国、军阀等各种性质的银行在重庆如雨后春笋般地相继开业，并发行各种纸币。国家银行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银行先后来渝开设分行，地方银行如复业后的浚川源银行、四川地方银行、四川省银行等。其间重庆本地商业银行也获得较大发展，先后有聚兴诚、美丰、大中、中和、平民、川康殖业、川盐、市民、四川商业、重庆、四川建设等银行开办，其中的美丰银行为重庆第一家中外合资商业银行。

到30年代中期，全川历年开设银行33家，其中就有22家设于重庆，全川共有各种银行总、分、支行处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平津沦陷，8月，日军进攻上海，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遂成为全国战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并于1940年定为中华民国陪都。随着时局的变化，沦陷区人民大量涌入四川、重庆，东部大批工矿企业纷纷迁渝，国家各大银行以及各省地方银行、商业银行相继入渝，各地游资亦接踵流入。此时的重庆，人口密集，市场兴旺，呈现一片战时经济的繁荣景象。重庆由一个西部区域性商业城市一跃而成为抗战大后方的经济、金融中心，而国家银行则是金融中心的主体。

为应对时局，稳定金融，促进后方经济的发展，“四联总处”（由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办事处改组而成）由上海迁来重庆，稍后，中、中、交、农四行的总行或总管处也迁来重庆。除国家银行外，各省陆续迁渝的银行有号称北四行的金城、盐业、中南、大陆银行；有号称“南四行”中的上海商业储蓄、浙江兴业、新华信托银行；号称“小四行”的中国通商、中国实业、中国国贸、四明银行，以及广东、湖北、河南等省行的分支行。重庆本地银行，如老字号的聚兴诚、美丰、重庆、和成、川盐川帮五大银行实力进一步增强，而新的银行还在陆续开办。1942

社会财富。或占领铜元局，滥铸质量低劣的铜圆、银圆，其减质、减重、大面额是其主要特点，或控制银行甚至设立银行大量发行既无准备金又难以兑现的纸币，导致币值低落，物价飞涨，给广大民众的生活带来灾难性影响。这一时期整个四川币制之紊乱，全国罕见。

1933年，“二刘”大战结束后，刘湘逐步统一川政，重庆政局也趋于稳定，银钱业遂得到恢复发展，货币混乱局面有所改观。但是，历年战乱造成的财政危机和欠债，以及为继续扩充军务、巩固地盘、围剿红军等巨额财政支出，使刘湘不得不继续加大发行钞票度日。四川地方银行仅一年时间，“地钞”发行量即逾3200万元。由于发行过量，贬值迅速，以致酿成严重金融风潮，多次发生因挤兑而致市民被踩死、踩伤事件。重庆银钱业流动资金多陷入新旧债中，市场现金短缺，利率、汇率直线上升，刘湘只得亲赴南京向蒋介石求援。1935年1月，南京政府派参谋团入川主持军事，财政部特派员亦到重庆调查整顿四川金融。3月，中央银行重庆分行成立，受命善后“地钞”事宜。四川军阀防区制结束，重庆成为国民政府控制西南的军政及经济要地。11月，为应对国际“白银风潮”引起的经济危机，国民政府进行重大币制改革，统一货币，推出法币，四川金融货币长期紊乱局面亦告结束。

断增加法币发行量,来维持庞大的军政开支。那么,在抗战结束后,特别是在1947、1948年所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则是蒋介石政权置民族利益而不顾,一意孤行发动全面内战,为解决战争军费,而变本加厉实行令世人震惊的通货膨胀政策,终致法币崩溃。

1948年8月,国民政府再次币改,推出了金圆券。此前法币的崩溃,可以说是蒋介石政权深陷解放战争泥潭的必然结果,而金圆券的粉墨登场,却包含着更为不可告人的目的。面对政治上危机四伏,军事上节节败退,经济上濒临崩溃,蒋介石自己心知肚明,失败的命运已无可挽回,金圆券的推出,即是蓄意在撤离大陆前所作的最后一次搜括与掠夺。

重庆是西南经济重镇,是国民政府最后撤退的城市之一,受金圆券及稍后银圆券之害也更深。金圆券从面市到寿终不过9个月光景,其贬值速度比法币更为迅速,物价上涨更为猛烈,可谓月月涨,天天涨,一日数涨,数月间,市面流通纸币的面额便从一元、五元、十元小钞一路跃升到十万、五十万、一百万大钞,甚至五百万、一千万、五千万面额金圆券本票也投入市场当纸币流通。1949年6月,重庆的交通运输、邮政等公用事业率先改用银圆计价收费,随后各商店也改用银圆标价,拒收金圆券。6月23日,国民政府被迫公布

年,汇丰银行重庆分行、麦加利银行重庆分行相继在重庆开业,这两家银行也是国民政府首次批准颁发营业执照的两家外资银行。到1944年,重庆已有各类银行达70余家,其中总行设在重庆的银行就有近40家。银行业资本达7亿余元,吸收存款13.5亿元,在渝银行业达到抗战以来的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重庆的金融货币,已进入国家统一货币即法币时期。法币流通初期,其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它不仅直接缓解了“白银风潮”所引起的通货紧缩、企业倒闭、市场萧条局面,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发展,为后来的艰苦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统一币制,消除了军阀割据时的货币混乱现象,才有可能统一调配国家财政金融资源,集中财力支持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

当然,在抗战后期,由于超量发行货币,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法币大幅贬值,从而对重庆人民的生活造成了灾难性影响。如果说,导致抗战后半期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最主要的因素还是战局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先后占领了上海租界、香港、缅甸等地,切断了我国与西方各国的海陆交通,封锁了物资运输通道,并加紧向华中、西南发起攻击,致使物源萎缩、财税枯竭,入不敷出,也就只能不

金圆券5亿元兑换银圆一元，承认银圆可以流通使用，实际是宣告金圆券在金融舞台上的丑恶表演狼狈谢幕。

1949年7月初，退踞广州的国民政府鉴于金圆券的彻底失败，无奈恢复银本位制，发行银圆券与银圆等价流通。重庆中央银行随即公布发行银圆、银圆券、银圆辅币券及相关兑换、流通办法。8月，长沙、福州等地相继解放，广州政府各院部、人员分批迁来重庆，随之带来的大量银圆券，对重庆市场造成冲击，致使物价上涨，银圆券贬值，遂引发重庆市民持券挤兑银圆事件。11月中旬，蒋介石再次紧急飞抵重庆，召集军政要人商讨对策，欲固守川东防线。而刘、邓大军进军西南解放贵州后，乘胜向川黔边界一线挺进，先后解放涪陵、攻占綦江。30日重庆迎来解放，蒋介石仓皇逃离飞往成都。12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成立，人民币成为唯一合法货币，广大市民持有的银圆券可按规定比例兑换人民币。至此，这些历经沧桑的老钱币，伴随着重庆城市发展的潮起潮落，走完了它的风雨历程，其间既有辉煌，也有黯淡。一枚枚旧币，一张张旧钞，将人们带入那逝去的岁月，并讲述那段历史的精彩片断。

票号、钱庄

票号

票号是以汇兑为主，兼办存放款、发行票据等业务的民营金融机构，可谓早期的中国式银行。票号在承汇时，以票汇方式交予汇款人一种有本号特有暗记的汇票，凭此票即可在全国联网的异地分号兑取现银，故习称为“票号”。晚清以来，重庆的票号有以山西人为主的西帮票号和浙江、云南商人开设的南帮票号。大名鼎鼎的日升昌票号即发源于重庆。

日升昌是中国票号的鼻祖，其创始人雷履泰为山西平遥人，他早年在天津开设日升昌颜料铺，往返于京、津、川贩卖铜绿，并在重庆设有分店，信誉颇高。乾隆时清政府有大批军饷需运往四川，而重庆日升昌商号恰有一批盈余款欲运北京。日升昌通过与其素有交往的清官员协商后，采取双方互为拨兑的办法，只以一纸信函，即解决了双方长途运送现银而蜀道艰险的不便和风险。重庆遂成为西帮商号最早经营异地汇业的发源地。约在道光初年，日升昌正式将颜料商号改为专营汇兑的票号。其后票号在重庆如雨后春笋，开埠前后达到16家，光绪年间最盛时有近30家，以西帮势力最为强大，如平遥帮的日升昌、蔚泰厚、百川通，祁县帮的大德通、大德恒等。

南帮票号以天顺祥最具实力。其创始者云南人王兴斋于1868年在重庆开设天顺祥商号，主要经营货运于川滇之间。一次，云南巡抚兼督办川省盐务的唐炯，急需现银10万两，重庆西帮票



清日升昌票号钱票样票。历史上的票号很重视信用，对发出的银票、钱票负责收回，并对汇票有严格的管理，一经兑现即行销毁。所以，票号的票据能流传下来的有如凤毛麟角

伍圓

老钱票

作通清以
專門人的
經營的
銀日
錢常
兌生
換活
的以
小及
錢商
據家
與的
錢貿易
鋪往
來所
重需
慶開
埠後
市面
文主
就大
錢中